

「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

蔡錦堂*

摘 要

紀元二千六百年為昭和15年，亦即西元1940年。明治初期日本政府設定第一代神武天皇於橿原即位之年為紀元（或皇紀）元年，西元1940年正值紀元二千六百年。這一年——介於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以及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始之間——日本政府動員全國民眾舉行史無前例的一連串奉祝活動，藉以對國民進行精神動員。奉祝記念活動包括打算於1940年舉行的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日本萬國博覽會、以神武天皇為祭神的橿原神宮之境域擴張整備等等。該年11月10日的大規模奉祝式典與隔天之奉祝會，集5萬5千人在天皇、皇后親臨下，於宮城前廣場盛大舉行。全國各地（含殖民地臺灣）的「奉祝行事」達1萬3千件、「記念事業」1萬5千件。但是2年前「國家總動員法」開始實施，禁止奢侈浪費的「七七禁令」起跑，同年10月「大政翼贊會」產生，近衛文麿內閣的「新體制運動」正式展開。在民間社會強調「奢侈即是敵人」，政治上高唱「八紘一字」，強行進入「總力戰體制」下之「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活動與戰爭體制交織糾葛。這一年在日本與臺灣，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它又具有什麼意義？本小論文試圖藉官方史料《紀元二千六百年記錄》等等，對「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作一探討。

關鍵詞：紀元二千六百年、八紘一字、神武天皇、橿原神宮、皇紀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一、前言

在臺灣老一輩接受過日本教育者，或許多少還記得以下的歌曲：

金鷄輝く 日本の 榮えある光 身にうけて
いまこそ祝へ この朝
紀元は二千六百年 あゝ 一億の胸はなる
(中譯： 金鷄耀輝 日本的榮光 映照吾身
衷心慶賀 就在今朝
紀元二千六百年 啊！ 一億民眾鼓舞歡欣)

這首名為「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歌曲，是戰爭期間為慶祝日本皇國所謂的「紀元二千六百年」，由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會以及日本放送協會，透過公開徵選所制定的、帶有流行歌風的輕快進行曲。這首歌曲經由日本中央政府，向日本全國以及殖民地臺灣、朝鮮等的官公廳、學校、職場等大力傳播，並由哥倫比亞唱片公司起用當時著名的流行歌手藤山一郎、霧島昇、二葉あき子、渡辺はま子錄製唱片發行，而廣為當時一般學生、民眾所熟悉。¹從這一年元旦起，日本、臺灣均陷入慶祝紀元2600年的氣氛中（見圖一）。

「紀元二千六百年」，以西元紀年法換算，即是1940年，或昭和15年。明治維新後，明治新政府於明治5年（1872）陰曆11月15日（陽曆為12月15日），發布太政官布告第342號，宣布「以神武天皇即位之年定為紀

1 這一首被稱為國民歌的「紀元二千六百年」，作詞者為增田好生，作曲森義八郎，歌詞共有五段，本文所列者為第一段。當時由奉祝會所制定的歌曲，另有一首由東京音樂學校作曲的「紀元二千六百年頌歌」，相對於流行歌風的「紀元二千六百年」，較屬莊重的儀式曲風。參閱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頁169-170。



圖一：皇紀2600年元旦・臺灣人家庭（摘自《二水鄉志》）

元元年」，²此即所謂日本之紀元，或者所謂「皇紀」之紀年法法治化的開始。那麼神武天皇——日本《古事記》《日本書紀》等「記紀神話」中，從「神皇」成爲「人皇」的第一代天皇——的「即位之年」，到底如何定出呢？

日本在7世紀推古女皇（聖德太子爲攝政）時期，開始採用中國式曆法，此曆法中亦含有由百濟僧侶勸勒所傳來的中國讖緯思想。根據此讖緯思想，十干十二支一巡六十年的21倍＝1260年週期，其最初的辛酉年與甲子年會有大變革產生。而推古天皇9年即爲辛酉之年（換算西元爲601年），由此一導入中國化大變革的辛酉之年，往上推算1260年（即西元前660年），並「認定」該年亦產生過重大變革——傳說中的第一代神武天皇

2 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頁2。

即位，日本國家創始之年於是定案。³1872年明治新政府太政官布告第342號，開始定出了西元前660年是為日本「紀元元年」。如此紀年法的規定，一方面清楚定出了日本皇國的起源——日本是神之國，日本的歷史是天皇家君臨的歷史；另一方面也表示出日本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擁有悠久歷史的國家。⁴

紀元二千六百年——西元1940年，正是1937年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之後的3年，也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1941年之前一年。介於對中、對美戰爭間的這一年，就日本紀元而言為一整數，正是日本政府可以用來進行國民精神教化、國家統合的一大良機。在戰爭體制下的這一年，於日本以及臺灣，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本文嘗試就這些事件作追蹤鋪陳，藉此來瞭解「紀元二千六百年」在戰爭時期所呈現出的意涵。

有關日本的部分，古川隆久的《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一書以及相關著作，均已有相當詳細的研究，本文理應不須再作陳述，但為襯托出該年臺灣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活動情形，仍先行就日本本國奉祝狀況以及背景因素等略作一敘說，以使清楚整體面貌，其次再對臺灣的活動項目作一探討。

二、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奉祝活動——日本篇

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奉祝活動，可說是近代日本於戰前所舉行的規模最浩大的活動。為了慶祝日本「建國」2600年，1940年11月10日於東京宮

3 同上註，頁2-3。根據《古事記》《日本書紀》，神武天皇為皇祖神天照大神的六代孫，自九州「東征」入大和地方，於橿原（今奈良縣橿原市）即位。如其年代為西元前7世紀，依據考古學尚屬繩文時代，很難認為當時已有統一的國家成立。一般認為以大和為中心的政治勢力統一全日本，大概在西元3、4世紀左右，而非西元前7世紀。

4 同上註，頁4-5。事實上於日本幕末、明治初期，一些具留洋經驗的學者，如：西周、津田真道等人同樣也主張採取西洋諸國的教祖生年為紀元的方式，取代中國式的傳統元號，而中國亦曾以1912年（中華民國元年）是為「黃帝紀元4609年」的紀年用法。

城（現皇居）前廣場，集合內外5萬人，在天皇皇后親臨下，由政府主辦了一場「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儀式。除此之外，中央政府、各地方（道府縣、市町村）、民間（各種團體、企業），以及殖民地臺灣、朝鮮、各佔領地等，均以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名義，舉行各種「記念行事」（指儀式或大會等）及「記念事業」（指建築設施的興建、或出版記錄等可留下記念事物者）。如以日本政府留下的公式記錄《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資料來看，當時所舉行的「記念行事」共計1萬3千件，參加人員計5千萬人；而「記念事業」共1萬5千件，所費資金總額超過1億6千萬圓（含預定建設者）。在戰時體制、物資吃緊狀態之下，規模堪稱空前龐大。⁵

本小論文無法一一對所有記念活動進行探討，底下僅就相關活動之重要項目予以陳述。包括：1.原本已確定舉行但卻中止的「夢幻」的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2.六大奉祝記念事業；3.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與奉祝會的舉行；4.其他重要活動。

（一）「夢幻」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1936年7月31日柏林奧運會開賽前召開的IOC總會，日本取得了4年後的1940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於東京舉行的舉辦權。這是起於1930年當時的東京市長永田秀次郎，以舉辦東京奧運會作為慶祝「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事業的提案。當時奧運會的舉辦，並非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都市為單位，能夠舉辦奧運正表示此都市乃世界一流城市的證明。東京市的提案，一方面也有顯示自1923年關東大震災以來，帝都復興的味道存在，而且提案開賽的第12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行時間（1940年）又「恰逢」皇紀整數、值得紀念的紀元二千六百年。當東京市於1936年成功取得亞洲城市首次舉辦奧運權後，銀座街頭遍掛日之丸國旗與五輪旗（見圖二），市內計射放

⁵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 別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2），頁182-183。

1000發煙火慶祝，並印製「祝紀元2600年東京奧林匹克舉辦決定」傳單20萬張，由3架飛機向全東京散發。⁶



圖二：1940年東京奧運海報
（摘自《日錄20世紀 1938》）



但是，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東京五輪即暗雲瀰漫，首先是該年9月眾議院內提出中止東京奧運主張；其次是陸軍省以「時局擴大」為理由，中止軍人等馬術選手的準備訓練；接著英國、瑞士等IOC委員遊說各國，只要日本不停止對中國軍事行動，就不參加東京五輪。1938年3月杉山元陸軍大臣於眾議院國家總動員法案委員會中，直言只要「支那事變」持續下去，則不考慮舉行奧運會。同年7月15日掌管五輪事宜的厚生省大臣木戶幸一，終於以「舉國備戰體制下不可能舉辦奧運」、「物資不足」、「軍需品調度最優先」等等理由，退還奧運會的主辦權。⁷《幻の東京オリンピック》作者橋本一夫指出：「在戰時體制下，使全國人民一致地處於精神緊

6 《週刊YEARBOOK日錄20世紀 1938年》（東京：講談社，1998），頁4。

7 《週刊YEARBOOK日錄20世紀 1938年》，頁5。東京放棄五輪主辦權後，轉由第二候補的芬蘭赫爾辛基主辦，但因1939年9月二次大戰爆發而停止舉行。

張狀態是有必要的。如果舉辦了奧運，國民則易輕浮失去緊張感。這是軍部所害怕的。希特勒利用五輪作為團結國民的利器，但日本軍部則完全不作此想。」⁸「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事業之一，也是全亞洲首次的第1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因為戰爭的因素而告停擺。東京奧運的再度實現是24年後，也就是二次大戰後1964年的事情。

(二) 六大奉祝記念事業

1930年代以來，日本中央以及地方討論或構想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事業即持續進行著，但一直到1936年7月1日於內閣正式設置「紀元2600年祝典事務局」與「紀元2600年祝典評議委員會」，日本中央政府實施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行事活動才正式定調。⁹

祝典評議委員會於1936年11月議決由國家負責的奉祝記念事業，共有如下六項：1. 橿原神宮境域與畝傍山東北陵（神武天皇陵）參道之擴張整備；2. 神武天皇聖蹟（主要為東征時之足跡）之調查保存彰顯；3. 御陵（代代天皇之陵墓）參拜道路之改良；4. 日本萬國博覽會的舉辦；5. 國史館的建設；6. 日本文化大觀的編纂出版。¹⁰

由國家負責的六大奉祝記念事業中，前三項均與神武天皇或皇陵有關，其支出概算第一項400萬、第二項30萬、第三項50萬，合計佔去收入（寄附金・國庫補助）1000萬的將近一半（當時的物價，啤酒一大瓶為40錢5厘，18歲新手女工的日薪不到1圓）。橿原神宮創建於1890年3月20日，祭神為日本建國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天皇家神社中，除供奉皇族祖先神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之外，以橿原神宮的位階最高（社格為官幣大社）。橿原神宮的創建其實與「皇紀」有特殊的關係：紀元二千六百年之

8 同上註，頁5。

9 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頁104-105。

10 同上註，頁150。

前50年的紀元二千五百五十年（西元1890年），最重要的記念事業即是於所謂神武天皇即位的橿原宮址建立橿原神宮。紀元二千五百五十年時，日本政府所構想的紀念計畫有兩大主軸：舉行亞洲首見的大規模「亞細亞大博覽會」，以及創建橿原神宮。結果當時的大藏省以應付外交、軍備即已「財政困難」為理由，縮減亞細亞大博覽會的規模，未邀請外國參加，僅於東京上野公園舉辦第3回內國博覽會；但是橿原神宮的建設計畫則順利完成。¹¹

關於第四項的「日本萬國博覽會」，早在1930年代初期，以阪谷芳郎¹²為首的財、政界人士即開始運作，主張舉辦萬國博覽會，以刺激產業、發展觀光、吸引外國遊客。萬國博覽會被列入六大奉祝事業之後，第一會場（東京之月島海埔新生地、晴海）所在的東京市即舉市債等為財源，開始編列奧運會與萬國博的道路、水道相關設施的整備預算。但是，1938年7月15日內閣會議決議放棄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權的同時，也決定將萬國博覽會延期至中日戰爭結束後再舉行，理由同樣是時值戰爭體制，舉國一致物心兩面總動員，以採長期戰的態勢，為達成聖戰目標而努力，因此不得不對奧運會及萬國博覽會作出中止與延期的決定。¹³

11 同上註，頁7-19。紀元二千五百五十年記念事業獲得實現的，除創建橿原神宮外，另有「金鷄勳章」的制定與招待政府高官和各國公使參加的宮中舞樂的演出（1890年的帝國議會召開與教育勅語的發布不算在內）。金鷄勳章是仿歐美對戰爭有功勳之軍人予以勳章，「金鷄」則取自神武天皇東征時，與敵人長髓彥苦戰，有金鷄（金色的鷲）停在神武天皇所持之弓上，發出金光，使長髓彥及其軍隊目眩無法作戰，神武天皇因而致勝的故事。此勳章因階級與功績分成7等級，並附支給年金，自1894年開始實施以迄1945年戰爭結束，獲金鷄勳章者共25萬5千人，同上註，頁17-19。

12 阪谷芳郎，（1863~1941），明治至昭和期之財經專家、政治家，近代日本產業、經濟大家洪沢栄一的女婿，歷任大藏大臣、東京市長、貴族院議員，1937~40年任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會副會長、子爵。《コンサイス人名辞典（日本編）》（東京：三省堂，1979），頁497-498。

13 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頁146-147。日本萬國博覽會真正落實舉行已是戰後的1970年，即大阪萬國博覽會，距離1940年夢幻的萬國博，已有30年之久。順便一提的是，1940年萬國博的「前賣券」（預售票）因延期而無法使用，但1970年大阪萬國博時則特別同意接受1940年的「前賣券」。

六大奉祝記念事業第五項為「國史館」的建設，建設費概算為300萬圓。國史館的建設亦與前述日本萬國博覽會的強力推動者阪谷芳郎有關。阪谷將建設國史館此一「大型博物館」與萬國博覽會作為配套，當作觀光的引爆劑，以及吸引外國觀光客、獲取外匯的工具。另一方面，當時日本國史學界專攻日本古文書學的權威、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兼史料編纂官黑板勝美（1871~1946），擔任首相私人諮詢機關的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準備委員會委員，亦認為非常有必要設立國史館，除陳列二千六百年間的歷史文物外，同時可作為日本精神作興運動的中心，以及社會上國民教育之場域。¹⁴可以說阪谷芳郎開始推動建設國史館的計畫，而黑板勝美則賦予國史館實質的內容。國史館原計畫建設於帝國議會舊議事堂址（原為鹿鳴館舊址）。依據1940年11月國史館營造委員會提出的「國史館施設內容要綱案」，展示內容以皇室關係資料：歷代天皇的「宸影」（天皇肖像畫）、「宸翰」（天皇親筆文書）、御撰集、即位式、大嘗祭、行幸等等有關皇室儀式之文物；以及神祇關係資料：有關神宮、神社祭祀、崇敬與神道、神祇尊崇資料；一般資料：自大和以迄現代之各時代國運昌隆、文化發展、舉國奉公等忠臣賢哲事蹟顯揚之文物。¹⁵簡言之，國史館即是以展示皇室、神祇、忠臣賢哲為主要內容，呈顯「國體史觀」的大型博物館。雖然國史館的建設經費、館址以及展示內容均大致有了計畫，唯最後到戰爭結束，仍然未能實現完成，或許因配套的萬國博覽會的中止、或許因戰爭激烈化、或物資不足之緣故。戰後1983年於千葉縣佐倉市開館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也許可以看作前述「國史館」的戰後版。

14 金子淳，〈歴史展示の政治性——「歴博」の前身・国史館計画の事例をもとに〉，收於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歴史展示とは何か 歴博フォーラム 歴史系博物館の現在・未来》（東京：株式会社アム・プロモーション，2003），頁57-65。

15 同上註，頁57、63。

六大奉祝記念事業的第六項：日本文化大觀的編纂出版，經費支出概算為100萬圓。1939年2月，文部省曾召集歷史學、美術史、文學史等一流學者設立日本文化大觀編修會，開始編纂作業，並於1942年出版《日本文化大觀（第一卷）》（古代至中世），之後亦因戰爭激化的關係而告中止。¹⁶

（三）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與奉祝會的舉行

如上述，日本政府與民間自1930年代以來，即針對1940年的「紀元二千六百年」，嘗試以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以及包含舉行萬國博覽會、擴建橿原神宮境域參道等在內的六大奉祝記念事業，來慶祝日本建國2600年，而各地方政府、民間團體亦積極籌辦各種紀念儀式、活動與記念事業，來祝賀這「特別的一年」。但是整個活動的最高潮，則是在這一年11月10日於首都東京「宮城」（皇居）前廣場所舉行的「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以及隔天11月11日舉行的「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會」。¹⁷

本來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的舉行，最恰當的日子應該是該年（1940年）的紀元節2月11日。所謂的「紀元節」，指的是「記紀神話」中神武天皇於橿原即位之日——西元前660年的舊曆1月1日，以西曆換算為2月11日（此即戰後日本的「建國記念日」）。但是當時的祝典事務局認為

16 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頁215。

17 其實在11月10、11日最大且最高潮的「式典」、「奉祝會」的前後，與日本政府或皇室有關的主要「公式行事」尚有：6月9-13日天皇參拜伊勢、橿原兩神宮以及神武、仁孝、孝明、明治天皇陵的「關西行幸」；10月11日橫濱海灘天皇親臨的「紀元2600年特別觀艦式」（指揮官山本五十六）；10月21日東京代代木練兵場天皇親臨的「紀元2600年特別觀兵式」（指揮官朝香宮）；6月6-9日（東京）、14-16日（關西）的「東亞競技大會」（奧運中止的代替方案，參加國與地區為日本、滿州國、汪精衛政權、菲律賓、夏威夷等共732人）；6月19日橿原神宮外苑競技場的「銃後奉公祈誓大會」；10月1-22日、11月3-24日的「紀元2600年奉祝美術展覽會」；12月東京歌舞伎座日本史上最大規模的管弦樂團「紀元2600年奉祝樂曲演奏會」。同上註，頁186。

「因種種關係，此日不適當」，而提議改爲大正、昭和天皇舉行即位大典的11月10日。¹⁸所謂的「種種關係」，其實是當時內閣於1939年4月11日閣議決定「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新展開の基本方針」時，已經期待利用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名目，來強化或具體實現所定的目標。自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央政府雖然打出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旗號，要求民眾爲了遂行戰爭應徹底執行節約消費、勤勞工作等目標，但效果並非十分彰顯，時值紀元二千六百年，政府乃試圖利用此難逢的良機，藉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名目挽回頹勢，再展開另一波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但如果「式典」的舉行是在年初的2月11日，2月式典結束後，以式典名目支援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熱潮不免逐漸衰退，因此主張將式典挪至年底的11月，以期1940年一整年均能維持住活動的熱度。¹⁹

昭和15年（1940）11月10日，「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於宮城前廣場舉行，會場前方中央設有爲天皇皇后等所建的神殿風格之「式殿」，²⁰會場置有可容5萬5千位來賓的席位，包含各國駐日大使、公使、武官、官民各階層（官公廳、團體、學校、市町村長、一般居民）傷痍軍人或戰死者遺族、滿州國、殖民地臺灣、朝鮮等，以及同年9月始結成軍事同盟的德國、義大利等國代表49,017名，另陸海軍儀仗隊、軍樂隊、東京音樂學校合唱團等1,500名。在軍樂隊演奏「君が代」國歌後，天皇、皇后、皇族與首相、各大臣入會場，上午11時式典開始。近衛文麿首相獻上祝賀神武開國以來皇室與國家繁榮的「壽詞」後，天皇接著發表發揚神武天皇「八紘一宇」的精神、期許對人類福祉與萬邦和諧有所貢獻的「勅語」；接著軍樂隊與合唱團演出「紀元二千六百年頌歌」，在禮炮與汽笛鳴響後，近衛首相

18 同上註，頁167。

19 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頁164-166。

20 此奉祝式典所使用的「式殿」，被稱爲「光華殿」，1942年被移築至東京小金井公園，成爲文部省國民鍊成所的建築物，戰後爲學習院中等科的建築物之一，平成天皇亦曾於此學習過。1993年成爲新開設的江戸東京たてもの園的遊客中心。同上註，頁228-229。

高呼「天皇陛下萬歲」，全員並三呼「萬歲」（圖三），30分鐘的式典結束，參加者「深感光榮」地拜領到「紀元2600年記念章」之紀念品。²¹



圖三：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
（摘自《朝日クロニクル週刊20世紀 1940年》）

翌日，11月11日在同一場所，除前一天式典參列者外，另加上奉祝會特別會員共49,868人，於下午2時參加「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會」。奉祝會總裁代理高松宮與外交團代表連續宣讀完「奉祝詞」後，天皇致盼望回復和平之日的「宣旨」。接著是「宴席」，天皇與5萬位來賓同席享用餐飲

21 同上註，頁189-190。能參加式典的5萬多人中，配屬於臺灣總督府官僚者有131人，朝鮮總督府327人，而屬「臺灣在住者總代」名額者共492名。《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 10》（東京：ゆまに書房，2002），頁365。

（以軍隊攜帶食糧為準的餐飲），並欣賞軍樂隊演奏與3千位兒童、學生齊唱國民歌「紀元2600年」，下午3時，於高松宮與全員三唱「萬歲」後，奉祝會結束，出席者領受了歷代天皇和歌抄錄的《列聖珠藻》，以及歷代天皇書簡等抄錄之《聖德余光》作為紀念品。²²

11月10日在宮城前廣場舉行「式典」的同時，日本內閣亦規定全國各地方、職場、學校等亦須舉行奉祝式，配合收音機的式典實況轉播高呼萬歲。在該年10月4日的內閣次官會議中即決定了「紀元2600年奉祝實施要綱」，並作出下列規定：各家庭當天早晨必須至最近的神社參拜；當天早上9時設定為國民奉祝時間，於各家庭或其他場所向宮城遙拜並高呼萬歲，此同時鳴放汽笛、警笛或鐘等，並利用收音機放送「國民奉祝時間」；市町村於神社、學校、公會堂等適當場所為市町村民舉行祝賀儀式；在海外之日本人於在外公館、日本人會等，適應各地實情於適當時間舉行奉拜式或祝賀式，並向宮城遙拜、高呼萬歲；舉行奉拜式或祝賀式時，最好齊唱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會選定之「紀元二千六百年頌歌」。²³根據以上之規定，11月10日、11日之式典、奉祝會，並不是只侷限於東京宮城前廣場5萬多人的集會而已，而是動員了日本國內各地、殖民地、甚至海外日本人聚集區，於同一時間進行同一的奉祝行事，當然這也包括臺灣在內。有關臺灣的奉祝狀況，將在下節探討。

（四）其他重要活動——以宮崎縣「八紘之基柱」建設為探討對象

根據日本政府的公式記錄《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當年以「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的名目，中央或地方政府、民間團體、企業、學校等所進行的「記念行事」共有1萬3千件之多，而「記念事業」有

22 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頁190-191。奉祝會總裁原為秩父宮，因肺結核病而缺席，改由高松宮代理。

23 《朝日クロニクル週刊20世紀 1940年》，頁2-3。

1萬5千件，²⁴欲作全盤分析殊不可能。因限於篇幅，本文僅選擇與紀元二千六百年有密切關係的「建國神話」中的天孫降臨之地、也是神武天皇東征出發之地的日向國（宮崎縣）於1940年11月25日建設完成的、高達37公尺的巨塔「八紘之基柱」作為敘述對象。

位於日本九州的宮崎縣，是在「記紀神話」中被認為皇祖神天照大神命令其孫（天孫）瓊瓊杵尊降臨人世間之地（日向），也是天孫瓊瓊杵尊的曾曾孫、即後來的神武天皇往大和東征前的居住地。宮崎縣的宮崎神宮與大和的橿原神宮是以神武天皇為祭神的全日本「唯二」的官幣大社。相對於明治維新之後才由新政府所創建的橿原神宮，宮崎神宮雖然創建年代不明，但鎌倉時代即已確知其存在，1885年時被列為官幣大社，1913年被賦予宮崎神宮之神宮號，因為明治政府刻意藉此彰顯皇祖聖跡傳承之地。²⁵

1930年代初期，宮崎縣即有意利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的機會，作為經歷1920年代以來一連串經濟、金融恐慌之後，鼓舞縣民克服困境、促進經濟復甦的手段。1936年東京奧林匹克決定後，宮崎縣甚至提案以「皇國發祥地」之名，讓日本國內奧運聖火傳遞以宮崎縣為出發點。²⁶1937年7月，警察官僚出身，曾擔任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長、朝鮮總督府外事課官僚的相川勝六²⁷接任宮崎縣知事後，更積極利用紀元二千六百與宮崎縣為神武天皇聖地的有利因緣，促進戰爭體制下的縣民教化，並動員縣民從事經濟開發（當時有河川開發、水力發電與造林計畫等），以追求地方之利

24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 別卷》，頁182-183。《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為日本政府的公式記錄，共13冊，10,555頁，於1943年出版時僅發行12部。2002年由ゆまに書房復刻出版。

25 岡田米夫，《日本史小百科 神社》（東京：近藤出版社，1977），頁256。

26 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頁158-159。由於1940年東京奧運中止的緣故，聖火傳遞以宮崎縣為出發點的計畫並未實現。但是1964年的第18屆東京奧運日本國內太平洋沿岸的聖火傳遞，即是以宮崎縣、本小節中所欲討論的「八紘之基柱」為出發點。

27 相川勝六（1891-1973），於擔任宮崎縣知事後，再歷任廣島、愛知、愛媛各縣知事以及厚生次官，1945年時為小磯國昭內閣的厚生大臣。戰時亦任大政翼贊會實踐局長。日本戰敗後，相川被自「公職追放」，1951年才獲解除，後當選眾議院議員。《コンサイス人名辞典（日本編）》，頁1。

益。²⁸1938年10月13日，紀元2600年「宮崎縣奉祝會」成立，相川勝六擔任會長，除了以國家預算36萬圓擴張整備宮崎神宮的境域、以及神宮徵古館的改築外，更驚人的大手筆是試圖匯集日本海內外各地來的石塊，建造一座雕有「八紘一字」文字的日本第一高塔。²⁹

「八紘一字」出自《日本書紀》中，記載神武天皇定都於橿原後所發表的詔勅中的詞句：「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六合」即天地及四方，或指宇宙；「八紘」原出於《淮南子》，指四方與四隅。1903年時日本的國體學者田中智學（1861~1939）從此詔書造出「八紘一字」之詞，作為「日本式世界統一的原理」之詮釋。³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強力倡導「八紘一字」之詞，即是由「紀元二千六百年」這一年開始的。該年8月1日新組閣的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發表「基本國策要綱」，提出「大東亞新秩序」，首倡「大東亞共榮圈」，並言：「皇國的國是乃基於八紘一字的肇國大精神」。³¹這是「八紘一字」一詞第一次成為公式用語。對此時日本政府而言，這句話的意思是：基於家族國家之理念，將其廣推於國際，使天下所有國家平等居於一個屋頂之下。但是，當然戰時以及戰後的許多國家或人民是根據日本國當時的「行徑」，對於「八紘一字」這句話作出了不一樣的解讀：日本試圖將世界支配於天皇之下而成為一個國家，「八紘一字」代表的是日本的「侵略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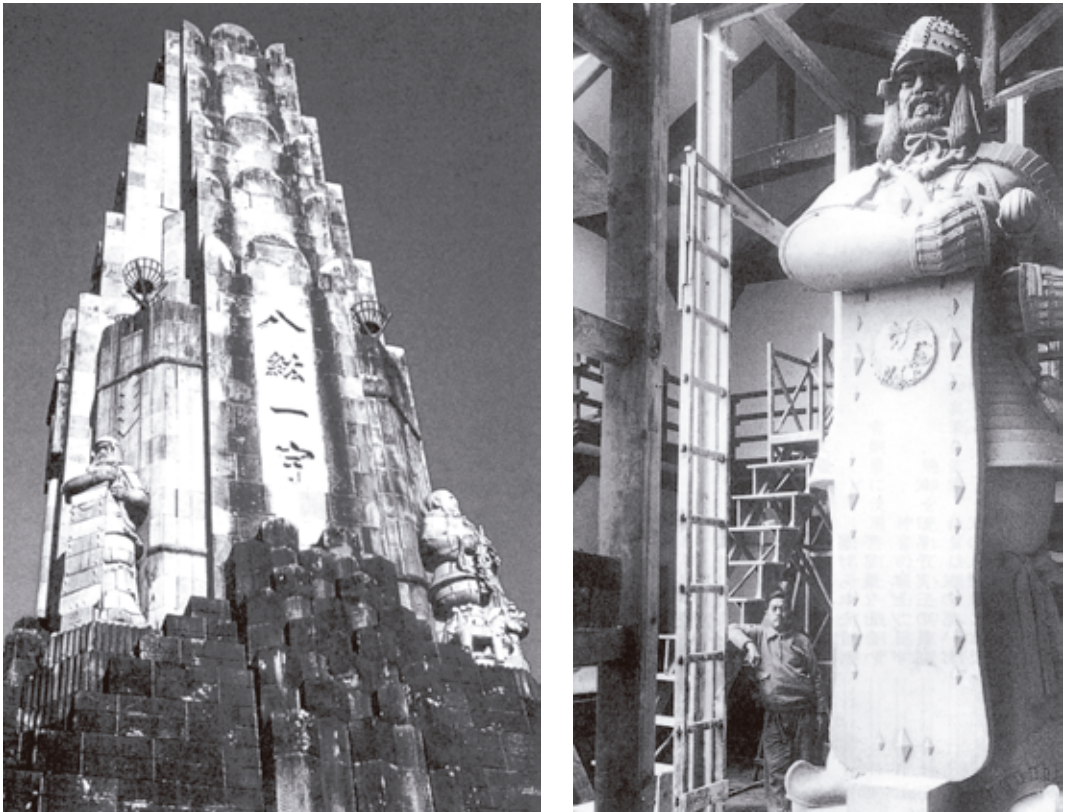
相川勝六聘請當時雕塑界泰斗、隔壁縣大分縣出身的日名子實三（1893~1945）來設計原名「八紘之基柱」、但後來一般稱之為「八紘一字之塔」的高塔（圖四）。高塔位於官幣大社宮崎神宮北方約2公里，神武天皇聖蹟地之一的八紘台（高50公尺的小山丘）上，塔高37公尺，比當時

28 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頁162-164。

29 三又たかし，《ある塔の物語——甦る日名子實三の世界》（宮崎：観光みやぎき編集部，2002），頁91-92。

30 新村出，《広辞苑》（第二版補訂版）（東京：岩波書店，1980），頁1798。

31 《朝日クロニクル週刊20世紀 1940年》，頁3。



圖四：（左）八紘之基柱（右）高6公尺的荒御魂陶像與雕塑者日名子實三
（摘自《ある塔の物語》）

全日本最高的建築物——東京車站前30公尺高的「丸ビル（丸大樓）」還來得高，航行於日向海上的船舶都可以清楚望見它。其柱（塔）由鋼筋水泥建成，鋪裝上日向石，形狀類似神道教儀式時使用的幣帛；正面雕刻有「八紘一宇」四字，係由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會總裁秩父宮所親書。基柱四周裝飾有4座高達6公尺的陶製（信樂燒）和御魂像、幸御魂像、奇御魂像與荒御魂像，分別代表工人、農人、漁人與武人。³²基柱正面「八紘一

32 三又たかし，《ある塔の物語——甦る日名子実三の世界》，頁128-129。

字」文字下端爲一青銅雕製門扉，上段欄間雕有日本皇室傳承的所謂「三種神器」：草薙劍、八咫の鏡、八坂瓊の曲玉，以及桺木；下端門扉則雕有神武天皇東征時自日向之美美津出航的船隊大軍的浮雕。據說此門扉之青銅是由全國小學生所捐獻出來的5至10萬枚一錢銅板所鑄造出來的。³³

青銅門扉的內部被稱爲「巖室」，乃是模仿奈良正倉院校倉造的祭壇式殿堂，正中央爲秩父宮所書「八紘一字」的真蹟置於奉安庫內。室內壁面是8幅石膏雕塑的作品，4幅代表古代神話的「波限產屋之圖」、「天孫降臨之圖」、「國土奉還之圖」、「紀元元年（神武天皇即位）之圖」，另4幅是「明治天皇東京遷都之圖」、「民族協和之圖」、「地球太平洋之圖」、「地球大西洋之圖」。此8幅雕塑原擬以銅版製成，但因銅原料不足的緣故，仍維持未完成的石膏塑樣。³⁴

基柱的正面雕刻「八紘一字」，背面則雕有「紀元二千六百年」字樣，背面下方爲書寫「大日本國勢記」的大理石，內容大致爲：大日本帝國爲神國，皇威遠播；日本的領土範圍與面積；日本與德、義盟約，正朝向建設世界新秩序之偉業邁進，以彰顯八紘一字之大理想。³⁵

值得一提的是，相川勝六計畫中的匯集日本海內外各地的石塊，透過報紙與各種媒體的宣傳，從縣內各市町村、日本國內各地、殖民地臺灣、朝鮮、日本軍支配範圍內的中國、新加坡、菲律賓、滿州國、關東州等等，共收集到1789個石塊，切成長45公分、寬60公分、厚15公分的石板，每塊都刻上寄贈者名，鋪設在基柱四周作成石垣。³⁶

33 相川知事曾以青銅門扉的材料是來自於對全縣家庭、民眾呼籲捐出蚊帳的的鈎勾、衣櫃的把手等銅製品，來間接否認利用政府發行的硬幣製造門扉，但亦有證言說就是取自於全國小學生供出的1錢銅板，因當時爲戰爭之非常時期，銅的物資缺乏；至於為何利用1錢銅板，主要亦是因為1錢硬幣並未印有皇室的「菊」之紋章。同上註，頁107-110。

34 同上註，頁111。

35 「平和の塔」の史実を考える会，〈「平和の塔」になぜ八紘一字？〉（宮崎：「平和の塔」の史実を考える会，2000），頁2。

36 三又たかし，《ある塔の物語——甦る日名子実三の世界》，頁96。

「八紘之基柱」整個工程起工於1939年5月20日，整地作業以及其他基礎工事，完全靠所謂的「祖國振興隊」（以縣民為主軸的小學、中學、高中、青年團、消防團、婦女團體、區會等之組織）的「奉仕」（當志工）作業進行。紀元二千六百年（1940）11月15日竣工，費時共1年6個月，動員6萬6千5百人之勞力，總工費67萬圓。³⁷

「八紘之基柱」完成後，日本銀行甚至在紀念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活動過程中，發行了以「八紘之基柱」為圖案的10錢紙幣（圖五），郵局並發行了「八紘之基柱」的紀念郵票。這些多少都增加了宮崎縣的觀光與經濟效應，但最重要的或許是透過青少年團等於戰爭時期的勞力「奉仕」，結合所謂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達到某一程度的精神教化。



圖五：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紙幣
（摘自《ある塔の物語》）

附帶一提的，1945年戰爭結束後，駐留宮崎縣的美軍於1946年8月即以基柱正面所刻的「八紘一字」文字，與四魂像中的荒御魂（代表武人）、塔背的「大日本國勢記」等，富有軍國主義色彩為由，自基柱上撤除；而嚴室內的秩父宮「八紘一字」真蹟，亦命令燒毀。但美軍撤離日本之後，1962年荒御魂像再度被複製安裝上，基柱正面的「八紘一字」文字亦於1965

37 同上註，頁119。

年再度復元。原被命令燒毀的秩父宮真蹟，亦被宮崎神宮的神官隱藏躲過燒毀一劫。「八紘之基柱」戰後被改名為「平和之塔」，基柱的所在地稱為「平上台公園」，1964年第18屆東京奧運會時，日本國內聖火傳遞，即是以此戰後所謂的「平和之塔」為出發點。³⁸

以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為起始的「八紘之基柱」，目前仍然聳立在以神武天皇為祭神的宮崎神宮北方2公里的山丘上，「八紘一字」四個大字也依然醒目，似乎在訴說一段深沉的歷史。

三、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奉祝活動——臺灣篇

(一)《臺灣日日新報》的相關記載

屬於日本殖民地一環的臺灣，在戰爭體制之下，當然免不了要被捲入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漩渦中。依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事務局1939年9月12日於內閣情報部紀元二千六百年部會提出並獲決議的「紀元2600年宣傳要領」，要求1940年1月1日以後須利用各種手段宣傳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意義。具體的說，譬如一般報紙雜誌，要在這一年中多刊載闡明紀元二千六百年意義的記事，特別在元旦、紀元節（2月11日）、以及祝典實施之日（11月10日）；而雜誌在1月、2月、11月號，必須登出或附錄闡明紀元二千六百年意義の記事、圖片、畫像等。³⁹臺灣的半官半民的主要報紙《臺灣日日新報》，在1940年的1月1日起就遵循祝典事務局宣傳要領的決議，在相關的日子大幅報導或利用民眾、企業、團體刊登奉祝廣告的方式，來呈顯或宣揚紀元二千六百年的特殊意義。1月1日的《臺灣日日新報》除了刊載總督、總務長官、臺灣軍司令官、馬公要港部司令官、南支派遣軍最高指揮官、拓務大臣等等要員，關於肇國精神昂揚、聖戰前途遼遠、新東亞建設光燦等等談話外，亦特別闢出高達十版的「迎春皇紀二千六百年」

38 三又たかし，《ある塔の物語——甦る日名子実三の世界》，頁26-27、105。

39 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頁168。

的大篇幅祝賀廣告。廣告的刊登者包含：各地方市街庄役所、協議會、各種組合、株式會社、醫師會、商會、官吏、議員、餐廳、電影院、商店、以及民眾個人等。⁴⁰其中臺、日雙方會社、個人名義者均有，並涵蓋從北到南、以及臺東、花蓮港、澎湖等臺灣全部區域，可以說是塑造出一番所謂「舉臺皆慶祝」的氣氛。之後幾天「廣告高潮」依然延續，有時亦加上「謹賀戰捷新春」配以「皇紀二千六百年」，更突顯出在非常時期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的異樣氛圍。

2月11日的「紀元節」，《臺灣日日新報》更於頭版以「輝やく二千六百年紀元節」（光輝的二千六百年紀元節）之大標題，突出2600年紀元節這一天的特殊性。頭版除了登出小林躋造總督、牛島實常臺灣軍司令官、高橋伊望馬公要港部司令官等有關2600年光輝歷史、意義深遠的神聖節日等談話，以及刊出讚美「悠久二千六百年歷史、包含神代萬邦無比」的記事外，亦以相當大的版面登出腰插寶劍、手持神弓的「神武天皇御尊像」。⁴¹

2月11日這一天《臺灣日日新報》的第3版，也以約三分之一的篇幅，登出「與內地人同樣 開啓姓名變更之途 臺灣戶口規則改正」，以及總務長官談「促進皇民化」、警務局長談「許可的方針」等等關於臺灣人「改姓名」的記事，從此開啓了臺灣人「改姓名運動」的歷史。⁴²

有關「改姓名運動」已有多篇論文探討，本文不再多予陳述，⁴³在此想

40 《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1月1日，各版。

41 《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2月11日，第1版。

42 同上註，第3版。

43 相關的論文諸如：近藤正己，〈「創氏改名」研究の検討と「改姓名」〉；Wan-yao Chou（周婉窈），“RENAMING ONESELF A TRUE JAPANESE: ONE ASPECT OF THE KOMINKA MOVEMENT, 1940-1945”，兩篇論文均發表於「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歷史系・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主辦，1992年7月。另外，上杉充彥，〈台湾における皇民化政策の展開——改姓名運動を中心として〉，收於《高千穂論叢》62:2（1987）。

要強調的是，臺灣人（特別是漢族系）因種種因素（或求學、或經商等）希望改成日本式姓名的事例於1937年前即已存在，但一直不被批准。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要求臺灣人改或取「日本名字」（不包括姓）的例子大增，但是正式「許可」臺灣人改成日本「姓」與「名」，則是始於1940年的2月11日。雖然筆者尚未掌握臺灣總督府何以特別選定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元節這一特殊的日子，讓漢族系臺灣人可以更改成日本姓、日本名，成為日文所謂的「正真正銘」的「日本人」或「日本皇國民」，但是相較於其他部分「奉祝行事」「奉祝事業」之「恰巧」或「順便」利用紀元二千六百年名目來祝賀，「改姓名運動」與「紀元2600年紀元節」結合在一起，臺灣總督府官方應有其特別的考量存在。

《臺灣日日新報》也自2月11日起，舉辦所謂「御神火奉納繼走大會」。「御神火奉納繼走大會」在「臺灣日日新報社」主辦，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臺灣聯合青年團後援之下，自2月11日紀元節起至17日止的7日間，從全島的青年團員中選出代表，手持來自橿原神宮的「御神火」，以類似奧林匹克運動會聖火傳遞的方式，不分晝夜兼行繼走，將「御神火」分納到臺灣全島社格為縣社以上的各神社，以使臺灣全島民眾能徹底瞭解神國日本的敬神思想的真髓，有助於培養國民精神。⁴⁴「御神火奉納繼走」於該日上午10時從所謂的「臺灣總鎮守」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出發，西迴路線沿臺灣西部經：建功神社、新竹神社、臺中神社、嘉義神社、臺南神社、高雄神社、阿緱神社，再渡海至終點馬公的澎湖神社；東迴路線則自臺灣神社經基隆神社、宜蘭神社、花蓮港神社，最終站是臺東神社。⁴⁵《臺灣日日新報》除了刊出「御神火」所經過分納的各個縣社名稱與照片，並詳細的將各區段奉納繼走的青年團員的姓名（臺、日青年均

44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 23》，頁324；另外，《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2月11日，第6版。

45 同上註，第6、7版。

有)刊登出來。⁴⁶這些被稱爲「千載難遇光榮奉仕神秘御神火」的青年團員，在傳遞聖火之前須先齋戒沐浴，作爲奉迎的準備。至2月20日止，《臺灣日日新報》每天都用相當多的篇幅刊載神火傳遞分納到各個縣社，甚至再分火至社格縣社以下的神社或「蕃地」的「社」的情形，最後再以參加神火繼走奉仕的青年團員們無限感激的感想文作總結。⁴⁷

其實在臺灣以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的名目，進行種種活動或建設的過程中，「神社」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這一部分留待底下探討。

11月10日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舉行之日，《臺灣日日新報》頭版刊頭以「輝く皇紀二千六百年を奉祝」（奉祝光輝的皇紀二千六百年）大幅反白字，突顯式典這一天的特殊意義。頭版除了仍然以刊載臺灣總督、臺灣軍司令官、馬公要港部司令官等的式典談話爲主，也刊登了由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助教授小葉田淳執筆的文章，就日本「肇國的精神」，即自天照大神之高天原統治、天孫降臨、神武天皇自日向東征奠都橿原的「肇國歷史」，以及明治聖代制定神武天皇橿原即位之年爲紀元元年、即位之日爲紀元節等等歷史與精神的內容，作了一番闡述。⁴⁸

11月11日的《臺灣日日新報》除了大幅報導東京宮城前廣場式典舉行的盛大狀況之外，也對臺北的「島都奉祝式典」以及當天晚上於臺北公會堂舉行的「奉祝之夜」作了詳細的報導。臺北的奉祝式典是在10日當天早上11時起（配合東京的式典時間）於新公園舉行，根據報導，參加者含各官廳、在鄉軍人會、婦人團體、銀行會社、青年團、町區會等200餘團體共5萬餘市民。首先由臺北市助役致開式詞（市長赴東京參加式典），接著全體同向東北方向的宮城遙拜；樂隊吹奏「海行かば」，祈願默禱興亞聖業

46 同上註，第7版。

47 同上註，2月11-20日報導。。

48 同上註，11月10日第1版。小葉田淳，1905年出生於日本福井縣，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畢業後，赴臺北帝國大學任講師、助教授，戰爭末期任國民精神文化講習會講師。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130。



圖六：島都奉祝式典（摘自《臺灣日日新報》）

達成與出征皇軍將士武運長久，國歌齊唱，紀元二千六百年頌歌齊唱後，市長代理奉讀詔書，然後參加者一齊拜聽宮城前式典狀況的收音機現場轉播，11時25分廣播傳來近衛文麿首相「天皇陛下萬歲」的呼聲時，在台上待機的森岡二郎總務長官（小林躋造總督赴京）與5萬參加民眾亦同步唱和三呼萬歲，在汽笛鳴響下結束式典。⁴⁹

報紙也報導了臺灣各地於同一時間同步舉行式典的情形，如基隆市高砂公園有2萬人、新竹市新竹神社有5千人參加等。另外，當天下午與晚上各地方的奉祝活動，如樂隊演奏、遊行、舞蹈、青年劇、演講會、神社祭典、各種記念表彰式等，報上也都有詳盡的報導。⁵⁰

（二）宮城式典臺灣參列者名單

能夠與天皇、皇后一起參加日本宮城前廣場「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與奉祝會者大約5萬多人，他們是經由祝典事務局與內閣祝典委員，經過

49 同上註，11月11日，第3版。

50 同上註，11月11日，第3版。

內閣各省協議、製作名單、審查資格等複雜程序之後才決定的。到底是哪些人能得此「殊榮」參加這個特別的盛典呢？藉此參加名單，或許某一程度可以檢驗各地方的政治、社會構造或官民之間的關係。依據《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臺灣方面參加者可分為屬於「高等官參列者」、「判任官同待遇者」部分的臺灣總督府參加人員，以及屬於「各外地在住者總代」的參加者兩類。臺灣總督府被核定參加的名單裡，「高等官參列者」共135人，為朝鮮總督府參加者270人的一半，佔高等官參列者總數7,343人的1.8%弱；「判任官同待遇者」131名（朝鮮總督府327名），佔全數5,769名的2.2%強。⁵¹

在屬於各外地在住者總代部分的「臺灣在住者總代」，依據《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其選定範圍共含以下50類：正五位以下有位者總代（現無官職者）、勳四等功四級以下帶勳者總代（現無官職者）、褒章受領者總代、師範學校長、中等學校長總代、實業補習班學校長總代、青年學校長總代、小公學校長總代、盲啞學校長總代、市長代表者（市會議員總代）、自治功勞者、公共土木事業之民間功勞者、警察官功勞記章佩用者總代、新聞通信事業功勞者、神職會代表者、消防組與防衛團代表者、所得調查委員總代、在鄉軍人會有功章受領者總代、在鄉軍人會聯合分會長總代、一戶有5人以上為現役軍人之戶主總代、軍事功勞者、辯護士（律師）會會長、公證人會代表、總督府教育會代表、州廳教育會代表、臺北市教育會代表、男女青年團代表、臺北市男女青年團代表、教育教化及學藝功勞者、神佛各教宗派及基督教與其他教團教師中之功勞者、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功勞者、產業團體代表、產業功勞者、運輸事業功勞者、拓務功勞者、醫師會長、齒科醫師會長、藥劑師會長、衛生醫事功勞者、社會事業功勞者、軍人援護事業功勞者、傷痍軍人總代、遺族總代、

51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 第6卷》，頁74、84。

官業從事員總代、國語普及功勞者、理蕃事業功勞者、勤行報國青年隊代表者、紳章受領者總代、水利事業功勞者、其他為總督府認為適當充任代表者。⁵²

依上述的選定範圍，祝典事務局經資格審查，最後所確定的「臺灣在住者總代」共有：臺北州157人、新竹州53人、臺中州80人、臺南州91人、高雄州66人、臺東廳20人、花蓮港廳18人、澎湖廳7人、總共492人，其中內地人、本島人均有，但似無高砂族。⁵³在《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所列名冊中，由於只記載州廳與人名，並無進一步的資料如參加者為內地人或本島人等，因此無從精確知悉內地人、本島人各佔多少名額，但如以名字方式簡單認定，本島人大約為48位，而內地人為444位。這48位本島人的名單如下：⁵⁴

- 〈臺北州〉 許梓桑・顏欽賢・林呈祿・戴興球・陳清波・許智貴・郭延（廷）俊・林熊光・林安繁（？）・許丙・林松子（？）・曾聯昌・顏炳煌・黃純青・林元弼・周良
- 〈新竹州〉 張福興・周租昭・劉陳光・林桶生・蔡德勝・黃維生
- 〈臺中州〉 朱阿貴・洪火煉・張蠡生・邱鳳池・廖添進・彭汝（如）勳・李崇禮
- 〈臺南州〉 梁道・廖重光・紀長・曾柱・楊士養・黃欣・王汝禎・陳鴻鳴

52 同上註，頁129-132。

53 各州廳參列者人數是由《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 第10卷》頁365-372之名單算出。

54 48位本島人名單為筆者就姓名「可能」屬本島人者所挑出，因此會有不精確之處。譬如臺北州的林安繁與林松子也非常有可能是日本人，因此筆者以？號註記。而臺北州的郭廷俊與臺中州的彭汝勳，原資料記為「延」與「如」字，一併更正。另外，雖然此時「改姓名」運動已開始，但從第一位改姓名的臺北州陳清波，尚未被登錄為「田川清波」來推測，屬日本式姓名者應該都是內地人，而不是改成日本姓名的本島人，故「改姓名」之因素不納入確定本島人與否的考量。

- 〈高雄州〉 龔天降・林慶如・林恩貴・李幾法・陳啓峰・陳啓貞・朱萬成・蘇杰・蕭恩鄉
- 〈臺東廳〉 馬榮通
- 〈花蓮港廳〉 饒永昌
- 〈澎湖廳〉 (無)

這些名單如從興南新聞社的《臺灣人士鑑》(昭和12、18年版)等等資料去對照,約有30位可以獲得身份、資歷確認,如:許梓桑、顏欽賢、林呈祿、陳清波、許智貴、郭廷俊、林熊光、許丙、黃純青……等。而昭和18年版的《臺灣人士鑑》黃純青部分,更明書其以「殖產興業功勞者」身份參加紀元二千六百式典;臺中州邱鳳池則是以所得調查委員州代表的身份參加式典。⁵⁵這些獲得「殊榮」得以參加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與奉祝會的本島人,是值得再作進一步調查、探討,本文暫且割愛。

(三)臺灣的「奉祝行事」與「奉祝記念事業」

爲了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日本全國從中央到地方,以及殖民地臺灣、朝鮮、勢力圈等,均利用名目舉行「奉祝行事」(指以一次爲限的儀式或大會)或是進行「奉祝記念事業」(指設施、建築或出版記錄等事後會留下的紀念事物)。根據前述《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因此次祝典而舉行的「奉祝行事」多達1萬3千件,而「奉祝記念事業」有1萬5千件。

依據此份日本政府所留下來的官方記錄,當時在臺灣所舉行的「奉祝行事」,筆者加以計算共有臺灣總督府4件、臺北州32件、新竹州17件、臺中州56件、臺南州72件、高雄州110件、花蓮港廳9件,合計爲300件。⁵⁶臺灣總督府舉行之4件奉祝行事爲:9月20日起4天的「臺灣體育大會」、11月

55 參閱《臺灣人士鑑(昭和18年版)》,頁114、155。

56 數字自《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 第23卷》,頁320-351資料中計算得出。

30日的「全島青年學校大會」、11月22日的「令旨奉戴二十周年記念全島青年團大會」、11月起10天的「日本人南洋發展史展覽會」。⁵⁷這些資料是由各地方應中央之要求而呈報，不見得精確，因此會出現臺北州僅32件，高雄州卻有110件，而臺東廳、澎湖廳均掛零的現象。另外，有一部分「奉祝行事」，例如學校或地方的學藝會、運動會、展覽會，或許原本是每年舉行的，但此年「恰巧」是紀元二千六百年，也就掛上了奉祝行事的名目。

在「奉祝記念事業」方面，根據上述的《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筆者加以計算，共有：臺北州63件、新竹州135件、臺中州1件、臺南州110件、高雄州134件、花蓮港廳32件，共計465件。⁵⁸臺中州僅有的1件為「植樹與造林」，而臺東廳、澎湖廳掛零，原因應可歸為地方政府未往上呈報資料，因為至少第二代臺中神社於1940年10月25日遷座完成，即是以紀元二千六百年的記念事業作為名目，⁵⁹但是在這份官方資料中並未呈顯出來。

在這些「奉祝記念事業」當中，含有造林植樹、運動場整備、忠魂碑建設、石燈籠奉納、國旗台建設、紀念圖書購入、鋼琴購置、相撲場設置……等等，種類繁多，不過，有一些現象值得我們注意。第一是在公、小學校方面，有許多學校利用所謂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的名義，建設「楠公銅像」與「二宮尊德銅像」。「楠公」指的是楠木正成，是日本南北朝時期忠於後醍醐天皇、對抗朝敵足利尊氏的人物，明治維新後被列為對天皇效忠盡瘁、戰死在所不辭的忠臣代表，戰前初等教育「修身」與「國史」教科書中，必然會出現他的名字。「二宮尊德」即二宮金次郎，貧農家庭出身，卻努力上進，後來成為江戶時代著名的農政專家，戰前

57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 第23卷》，頁320。

58 數字自《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 第19卷》頁569-610資料中計算得出。

59 島山喜三郎，〈臺中神社御造營に就て〉（資料來源待查）。

公、小學校中背負柴薪手捧書本用功不倦的孩童銅像，即是二宮尊德。二宮尊德與楠木正成一樣，是修身教科書中最著名的模範群像之一。至少包括四腳亭、士林、大南澳、景尾、新竹第一、新竹第三、住吉、新湖口、湖口、香山、石光、中壢第一、中壢第二、大崙、宋屋、楊梅、新屋、大坡、桃園第一、桃園第二、埔子、龜山、大溪、員樹林、竹南、尖山、三灣、造橋、後龍……等近百所的公學校，在校園裡建設楠木正成或二宮尊德的銅像，⁶⁰無非是結合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進行「忠君愛國」、「勤勞奉仕」的精神教育。較為筆者質疑的是，這些銅像的建設計畫，最後真正落實完成的有多少？因為愈至戰爭後期，銅的資源愈是缺乏，甚至出現了有些學校反而必須捐出銅像以報國，改豎立陶製二宮像等作為取代的現象。

奉祝記念事業中第二個較值得注意的是「御真影奉安殿」或「奉安庫」的設立，計畫建設的學校有：瀧川、中壢第二、三坑子、苑裡、通霄、新高、蚵寮、溪底寮、宅子港、七股、蒜頭、大寮、溪埔、田草埔、烏龍、水漣……等公學校與小學校。⁶¹「御真影奉安殿」是在學校等教育場所，用來奉置當代天皇、皇后肖像（御真影）以及教育勅語謄本的建築物，規模稍小的則不建奉安殿而只設「奉安庫」（或稱奉安櫃、奉安金庫），置於校長室內。教育勅語全名是「教育勅語」，1890年10月30日由明治天皇頒布，內容以儒家五倫的家族主義為基礎，強調教育的基本在於「忠君愛國」、「忠孝一致」，一旦國家有難，須「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的皇運」，是戰前日本國（含殖民地臺灣）國家主義式的最高教育理念。⁶²教育勅語謄本與天皇・皇后御真影平時置於奉安殿內，遇元旦、紀元

60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 第19卷》，頁569-610。

61 同上註。

62 片山清一，《資料・教育勅語——煥發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東京：高陵社書店，1974），頁102-125。

節、天長節（當代天皇生日）或其他特殊節日（於臺灣另外加上始政記念日）則在集會時取出，由校長奉讀教育勅語並作訓誨。透過莊嚴的奉讀儀式以及納入修身教科書中的課文，學生被要求背誦教育勅語，身心均深刻記憶「忠君愛國」乃是教育的最高真諦。⁶³因此，配合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的良機，許多公、小學校便計畫建設御真影奉安殿或設置奉安庫，以趁勢廣植忠君愛國教育理念。

第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有許多地方將「神社」的創建、擴建、遷建、或神社參道的整備、甚至學校內設置「校內神社」、「大麻奉齋殿」等與神社、神道教有關的事項，列為奉祝事業項目去執行。祝典記錄中登載神社建造的有：癩療養所樂生院境內神社、新竹神社、楊梅神社、竹南神社、頭分神社、銅鑼神社、苑裡神社、大湖神社、官田神社、大內神社、古坑神社、鹽水神社、林內神社、大東神社（斗南新崙）、六甲神社、美濃神社、內門神社、枋寮神社、常磐社（屏東里港）等；境內擴張工事者有：北港神社、東港神社、鳳山神社、佳冬神社；參道整備者：甲仙神社；建「校內神社」者：基隆中學、大坪林公學校、斗南公學校；設「大麻奉齋殿」者：山腳公學校、新店公學校、富里公學校。⁶⁴這裡面的新竹神社，原於1918年10月25日即已創立，1920年2月社格列為縣社，1936年以社殿長期遭受蟻害以及擬擴張境域，起議重新建造；1938年更擴大計畫，作為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事業，組織新竹神社御營造奉贊會，列經費60萬圓予以改建，紀元二千六百年（1940年）的10月竣工，並於同月25日舉行遷座祭，此即為第二代的新竹神社。⁶⁵

其實除了上述全臺各地多所神社或學校「校內神社」「大麻奉齋殿」藉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紛紛建造、擴整外，另外臺灣三所重要的神社，

63 同上註，頁233。

64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 第19卷》，頁569-610。

65 《縣社新竹神社調書》，頁13-15。

亦是於此時進行創建或改建。這三所神社是：與新竹神社同於1942年11月27日獲准昇格為國幣小社的臺中神社、有「臺灣靖國神社」之稱的臺灣護國神社、以及「臺灣總鎮守」官幣大社臺灣神社。關於臺中神社已如前述，1937年舉行地鎮祭，1940年10月25日作為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事業遷座完成，也是第二代的臺中神社。而臺灣護國神社乃是紀元二千六百年的7月18日，以「臺灣總督指定護國神社」之位階，沿襲日本內地護國神社的建立方式，於1941年1月15日舉行地鎮祭開始動工，1942年5月竣工，同月22日舉行鎮座祭，工事費用由國庫補助20萬、臺灣護國神社造營奉贊會負責籌募20萬圓。⁶⁶官幣大社臺灣神社於1901年創建以來，社殿亦是遭受蟻害，1936年總督府即以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事業之一，計畫改築擴建社殿並擴張整備境域，整個工事費用達350萬圓；⁶⁷同時，自臺北市內至臺灣神社的「勅使街道」，也於1936年起以總公費166萬餘圓擬將寬度由10公尺增寬為40公尺之大街道，長度亦延伸至3,200公尺，兩旁與步道遍植樟樹與楓樹，預定完成時間即設定為紀元二千六百年。⁶⁸

其實，在紀元二千六百年年底，臺灣神社造營奉贊會另外又提出自紀元二千六百年起的5年「臺灣神社外苑大造築計畫」，計畫中的「外苑」位置於神社內苑東方大直一帶約34萬平方公尺的區域，中央位置打算設立約5萬平方公尺、可以容納約14萬人的大廣場，其中心擬為可容1萬5千人的團體體操場，作為運動會的場所外，亦可作為青年團或市街庄舉行種種儀式的場地；大廣場的西南方擬設可容納2萬人的「大野球場」，東南方則設同樣可容納2萬人的「陸上競技場」，旁邊為網球場

66 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年），頁152-153。

67 同上註，頁149-150。

68 大塚清賢，《躍進臺灣大觀 續續篇 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臺灣特輯記念號》（日本：中外每日新聞社，1939年），頁163。

與練習場，設備規格均比照國際標準；大廣場南端正門西側設可停駐300輛汽車的停車場，東西北三方則設腳踏車停車場；而如資材足夠亦擬建設游泳池、相撲場、武道場、射箭場；外苑前的基隆河一千數百公尺直線河道可進行端午競舟；另外，研修道場的正面、虎形碑的東側建造可容納勤勞奉仕隊300人的常置宿舍。全區域背後一帶植保安林，區域內廣植樹林、草皮、泉池，使成莊嚴明朗之綠化地帶，完成後既是鎮護全島之神的神苑所在，亦是研修鍛鍊的理想大殿堂。⁶⁹

這個在紀元二千六百年年底提出的「臺灣神社外苑大造築計畫」，最後因戰爭激化與日本戰敗而未能實現。不過從以上環繞紀元二千六百年的臺灣種種奉祝事業看來，「學校」與「神社」是最善於被利用作為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活動、藉此滲透所謂忠君愛國之國民精神到學生與地域民眾的絕佳場所。

四、紀元二千六百年在戰爭體制下的時代意義 ——代結語

如上所述，在紀元二千六百年這一年，日本政府動員了全國民眾，為慶祝神武天皇於橿原即位以來二千六百年，史無前例地舉行了一連串的「奉祝行事」與「奉祝記念事業」。為了奉祝「值得紀念」的這一年，日本放送協會NHK元旦即在橿原神宮現場轉播大鼓演奏，宣告「皇紀2600年的黎明」開始，該年並多次播出「國史劇」「神社めぐり」（神社巡禮）等紀念紀元二千六百年的節目。⁷⁰除了紀念郵票（圖七）、紀念鈔票的發行，奉祝歌曲「紀元二千六百年」國民歌，也透過廣播、唱片與學校教學，在學生與一般民眾間造成流行。這一年，香煙品牌「ゴールデンバット」（Golden Bat）改名為「金鷄」，「チェリ」（Cherry）成為「櫻」，

69 《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12月11日，第2版。

70 下川耿史，《昭和・平成家庭史年表（1926-1995）》（東京：河出書房，1997），頁111。



圖七：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郵票首日封（筆者收藏）

而臺灣總督府專賣局也為紀元二千六百年特別發行了紀念香煙「八紘」8千萬支，於奉祝式典舉行的11月10日開始發售。⁷¹這一年，戰時體制下軍國風的「勝、進、弘、勇、清、勳、武、博、功、實」等名字，仍然佔男生名字的前10名，「紀男、紀夫、紀雄」等取自「紀元二千六百年」的「紀」字名字，雖然沒能搶進前10名，卻也大流行；而以前不算多的女生名「紀子」，這一年躍進排行榜第一名。⁷²甚至因為紀元二千六百年末尾的「0」字，據說日本艦上戰鬥機也被取名為「零式艦上戰鬥機」，簡稱「零戰」。⁷³這一年，日本與臺灣均捲入了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奉祝漩渦中。

但是，戰爭的暗影也同時掩覆日本與臺灣。1937年7月中日戰爭開始，10月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展開，1938年4月「國家總動員法」發布，戰時體制與物資、經濟統制愈趨強化。進入1940年（紀元二千六百年），4月

71 《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9月20日夕刊，第2版。

72 紀田順一郎，《名前の日本史》（東京：文藝春秋，2002年），頁135-136。

73 本資料引用自：FUKUSHI's Web Page (<http://www001.upp.so-net.ne.jp/fukushi/>)。

時內閣決定米、味噌、醬油、砂糖、火柴等民生用品採用「切符」（票）制度，進行配給統制。7月7日實施「奢侈品等製造販賣制限規則」，也就是所謂的「七七禁令」，限制奢侈品的製造與販賣。8月1日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在東京市內豎立「ぜいたくは敵だ」（奢侈即是敵人）的看板1,500塊，不旋踵此戰時標語即「流行」於全國各地。同年11月2日「大日本帝國國民服令」公布，鼓勵民眾穿著「國防色」（卡其色）國民服。⁷⁴

在政治方面，1940年8月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開始推動「新體制運動」，10月12日「大政翼贊會」正式成立，所有的結社均遭禁止，所有政黨均消失於無形，開始朝「臣道實踐」的國家總體戰路途邁進，而臺灣於隔年4月19日亦成立了臺灣版大政翼贊會——「皇民奉公會」。

總的來說，「紀元二千六百年」充滿了「奉祝活動」的氣氛，行政當局利用紀元二千六百年此一機會，試圖展開令一波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但卻又交織糾葛著人民生活物資與經濟遭受統制的戰爭非常時局的矛盾情境。

國民歌「紀元二千六百年」當時相當流行，目前70歲以上的長者或許還記得曲詞，但是在流行之餘，當時最「著名」的並非原版歌詞，而是以下所謂「替え歌」（改編版）的歌詞：⁷⁵

「金鷄」上がって15錢　栄えある「光」30錢
今こそ来たぜ　この値上げ
紀元は二千六百年　ああ一億の民は泣く

74 《朝日クロニクル週刊20世紀 1940年》，頁4-7。另外，1937年廣島縣內女學校決定每星期一攜帶的便當改為「米飯與一粒梅子」、狀似日本國旗的「日之丸便當」，因相當符合時局而受好評，到1939、40年高呼「奢侈即是敵人」的年代，「日之丸便當」更是大為流行。參閱下川耿史，《昭和・平成家庭史年表（1926-1995）》，頁105。

75 本資料引用自：<http://www.tanken.com/hosyukuka.html>。

(中譯：「金鷄」香煙漲到15錢 光榮的「光」(香煙名)要30錢
就是現在 漲價風正起
紀元二千六百年 啊！ 一億人民哭泣)

「金鷄」上がって15錢 栄えある「光」30錢
それより高い「鵬翼」は 苦くて辛くて50錢
ああ1億のカネがいる

(中譯：「金鷄」香煙漲到15錢 光榮的「光」(香煙名)要30錢
更貴的「鵬翼」(香煙名) 叫人咬牙又心疼50錢
啊！ 我們需要1億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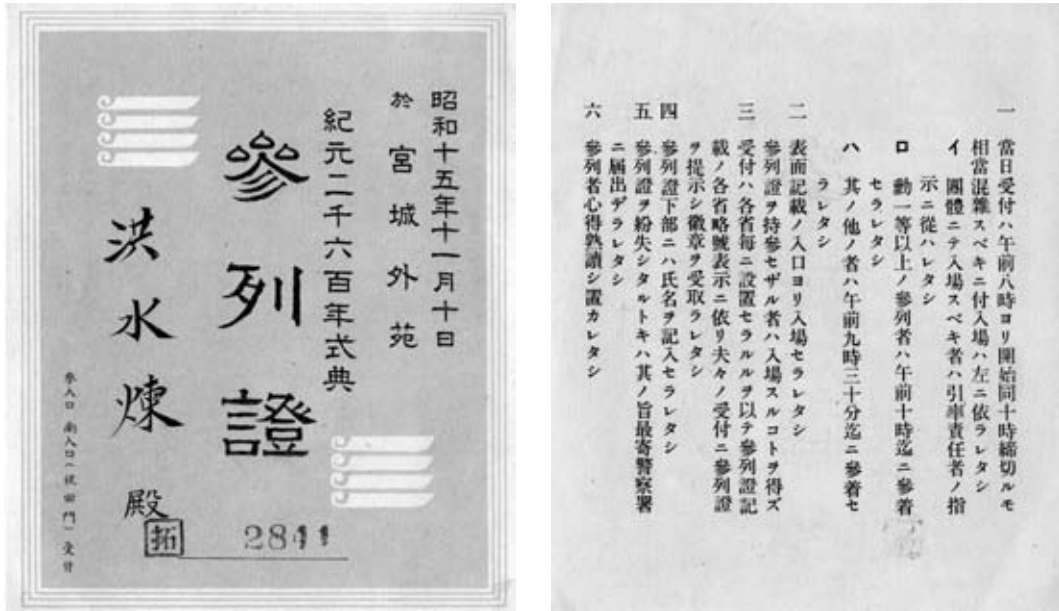
當時日本民眾還將當年的流行語「ぜいたくは敵だ」(奢侈即是敵人)，中間插入一「素」字，成為「ぜいたくは素敵だ」(奢侈好棒)。從這些「世相」，或許更能嗅到時代的味道。

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森岡二郎在紀元二千六百年11月10日晚間於臺北市公會堂舉行的「奉祝之夜」，背對著演講台上「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八紘一字 天業奉頌」的輝煌大標語，向參與奉祝會民眾所談的主題卻是：昭和13年(1938)8月以來至15年8月，本島違反經濟統制件數10萬5千件，關係人數10萬8千人，逐年隨著熟知法令的人數增加，違反規則的件數也呈幾何級數成長。⁷⁶戰爭體制下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總務長官卻不得不談民眾違反經濟統制的實質生活問題，正突顯出此一時代的問題糾葛。

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結束之後，同年11月15日，大政翼贊會迅即祭出：「祝ひ終わった、さあ働かう！」(慶典結束了，開始工作吧！)的

76 《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11月11日，第3版。對森岡總務長官的談話，報紙取的標題是：「奉祝記念演講會 熱烈演說感人甚深」。

標語，再度回復到緊張的戰時體制。⁷⁷而更艱苦困頓的紀元2601~05年，則等著檢驗紀元二千六百年這一波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成果。



圖八：紀元二千六百年式典參列證（左：正面；右：反面）（郭双富先生提供）

77 《朝日クロニクル週刊20世紀 1940年》，頁8。

引用書目

《臺灣日日新報》

《縣社新竹神社調書》

《週刊YEARBOOK日録20世紀 1938年》。東京：講談社。

古川隆久解題

2002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録》（全26巻・別巻1）。東京：ゆまに書房。

古川隆久

1998 《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皇室ブランドと経済発展》。東京：中央公論社。

三又たかし

2002 《ある塔の物語——甦る日名子実三の世界》。宮崎：観光みやざき編集局。

2002 《朝日クロニクル 週刊20世紀 1940（昭和15年）》。東京：朝日新聞社。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

2003 《歴史展示とは何か》。東京：株式会社アム・プロモーション。

金子淳

2003 〈歴史展示の政治性——「歴博」の前身・国史館計画の事例をもとに〉，收於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編，《歴史展示とは何か 歴博フォーラム 歴史系博物館の現在・未来》。東京：株式会社アム・プロモーション。

「平和の塔」の史実を考える会

2000 〈「平和の塔」になぜ八紘一字？〉。宮崎：「平和の塔」の史実を考える会。

岡田米夫

1977 《日本史小百科 神社》。東京：近藤出版社。

近藤正己

1992 〈「創氏改名」研究の検討と「改姓名」〉，收於臺灣大學歷史系・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主辦，「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Wan-yao Chou (周婉窈)

- 1992 “RENAMING ONESELF A TRUE JAPANESE : ONE ASPECT OF THE KOMINKA MOVEMENT, 1940-1945”, 收於臺灣大學歷史系・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主辦,「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上杉充彦

- 1987 〈台湾における皇民化政策の展開——改姓名運動を中心として〉, 收於《高千穂論叢》62:2。

三省堂編修所

- 1979 《コンサイス人名辞典(日本編)》。東京:三省堂。

新村出

- 1980 《広辞苑》(第二版補訂版)。東京:岩波書店。

興南新聞社

- 1943 《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

片山清一

- 1974 《資料・教育勅語——煥發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東京:高陵社書店。

畠山喜三郎

〈臺中神社御造營に就て〉。資料來源待查。

蔡錦堂

- 1994 《日本帝国主義下台湾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

大塚清賢

- 1939 《躍進臺灣大觀 續續篇 奉祝紀元二千六百年臺灣特輯記念號》。日本:中外毎日新聞社。

下川耿史

- 1997 《昭和・平成家庭史年表(1926-1995)》。東京:河出書房。

紀田順一郎

- 2002 《名前の日本史》。東京:文藝春秋。

“Kigen 2600” in Japan and Taiwan

Chin-tang Tsai

Abstract

Kigen 2600, also Showa 15, is the year 1940. In the early Meiji era,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stipulated that the year, in which Jinbu Emperor ascended the throne in Kashiwara, to be Kigen (Kohki) 1. Before this year, the Sino-Japanese War broke out in 1937; afterwards, the Pacific War took place in 1941. In Kigen 2600,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esprit de corps, mobilized the whole country to hold a series of celebrations and commemorations, including the 1940 Tokyo Olympics, Japan World Fair,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Kashiwara Jinguh, which worshiped the Jinbu Emperor. On November 10, 1940, the major celebration ceremony was held in the Jinguh plaza, followed by the other celebrations on the next day with the attendance of the Emperor and the Empress and 55,000 people. In that year alone, 13,000 celebrations and 15,000 commemorations were held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including the Taiwan colony.) However, Kigen 2600 was the year intertwined with celebrations and various wartime events. Since 1938, the National General Mobilization Law and the July Seventh Ban, an anti-extravagance ban, had been put into practice; in October 1938, the Taiseiyokusan Kai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New Order Movement of the Fumimaro Konoe cabinet started. The propaganda of “Extravagance is Our Enemy” was widely promoted among the public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as calling for the idea of “Hakko Ichiu” (eight corners of the world under one roof.) The whole country was under the system of “General Mobilization.” What events took place in Japan and Taiwan in this specific year and what significance do they carry? Based on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document *Kigen 2600 Report*, this paper will look into the Japan and Taiwan in Kigen 2600.

Keywords: Kigen 2600, Hahkoichiu, Jinbu Emperor, Kashiwara Jinguh; Kohki